

梁漱溟先生曾将他的治国理念归纳为16个字,曰:父慈子孝,兄弟弟恭;朋友相善,天下大同。这16字方针能否治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姑勿多论,但他描述的这幅图景着实是个理想乐园、清平世界。他这段话的说出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看看今天的世道人心,怎不让人悲哀且无奈!

但也不全是悲哀,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君子风、达人在,比如作家柳萌。

我与他相识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那年秋天,癫狂血腥的风已经式微,内蒙古文化局邀请一些词曲作者集中于呼和浩特,试图创作一批歌曲。一天下午,诗人张之涛领来了初届中年的柳萌。看着他近视镜片后面苍郁的目光,盯着他满脸沧桑的纹路,我们这三个从不同路径因不同原因从北京发配内蒙古的朋友虽初识的快乐笑语不断,还是吟出了心底的伤痕和暗影。后来从之涛处得知,柳萌原是“右派”,那时在《乌兰察布报》编副刊。既有这样的“前史”,虽初识不便详谈,其人生的坎坷泥泞也可想见。我那时在《巴彦淖尔报》编副刊,因比他小几岁而没进入右派行列,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有灵犀”,从心理到情感都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心理距离不远,路途距离却不远,从巴彦高勒到乌兰察布这近千里的路程怎能经常来往?我们只能互寄自己所编的报纸和各自的近作,偶有几行书信而已。

我们真正交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像大地还阳,那几年,我们这些从京城散佚各地的大小文人一个个走出冻土回到北京。我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柳萌回到工人日报社文艺部。不记得是谁从谁的文章中找到对方已回北京的踪迹,于是就互通电话相约往访。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一个星期日,他竟携嫂夫人爬上五层楼来到东四北大街我刚搬入的出版社宿舍。新家简陋,又无准备,妻子一下子为招待客人慌了手脚。那时民风质朴,大家都穷,谁也没想到要去饭店宴请。或许是他看出了我们的慌乱,于是亲自声明他们刚吃过饭,因为急于见面所以不请自来。就这样,他没感到唐突我已忘了愧疚,几杯清茶伴着我们回归故里的喜悦兴奋竟聊得忘了时间。之后,内蒙古的老友们一个接一个进京,李延龄、刘云山、田聪明、贾方舟、梁衡、徐泓、冯粒、查干、张凤柱、张善明、孙士杰……有的为官,有的从文。又之后,北京的老友也一个个复出,从林中、胡思升、缪俊杰……几年后,又结识了王朝柱……这样,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我们都相互引荐,互为友人,那些年几乎月月聚会甚或一个月两三次,大家都在盛年,大家都在自己喜欢的位置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谁也没想到岁月催人、命运还有什么灾难。

然而命运弄人,不久,我们俩的家庭都出了变故:他家嫂夫人是原河北师范学院(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系毕业生,之后任职于河北唐山市某中学音乐教师,“文革”中,因背负柳萌的“右派分子老婆”罪名被整得死去活来。先还身无大碍,回京后团聚了、安定了,刚过几天好日子,神经系统却出了毛病;我家倒都健康,妻子却因出身复杂,家人多在海外,历次运动磨难多多,全家人怀着余悸去了美国。妻几次跟我商量也要带着孩子移民,这就把我推入犹豫的深渊:去?不舍这正待开辟的文学天地,更不舍离别十多年后刚温热的故都故土和年迈的父母;不去?自此妻儿长别谁知何年何月再团聚!一年多的迟疑后,我仍去留难定,妻则带着儿女去了美国。从此,我这曾经温馨的小家一下子残破分离,我也陷入了中年的孤独。或许因为有过相类的经历,柳萌总是比其他朋友有更细心的关切,过年过节或周末常常叫我去他家一聚。一天

## ■记忆

# 真诚,永不消弥

□李硕儒

傍晚,他又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吃晚饭。骑车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做饭,做的是大米粥、烙饼并炒了几样家常菜,大嫂则正绕着钢琴散步。见长我几岁的老大哥如此忙活,我有些不忍地踅进厨房。他一见我,笑笑说:“她又犯病了,又不肯吃药,只能把药放在粥里,待会儿你配合一下。我答应着,他的良苦用心不由得让我心生酸涩。

我们谈天说地地吃饭,尽量想将气氛营造得轻松些。“这粥怎么有点苦啊?”嫂子吃了几口大米粥叨念着,将眼睛转向我。

“……这菜做得这么香,粥怎么会……”说着,我也喝了几口粥,之后笑望着柳萌说,“是,是有点苦,柳萌,是不是忘了搅锅了?”

柳萌心领神会:“咳,只顾炒菜,真忘了搅锅了……”我俩互看了一眼,嫂夫人这才释然,继续吃粥。

几十年来柳萌对夫人的体贴呵护在文学界可谓有口皆碑。柳夫人在大学是学钢琴的,回京后,他们攒的第一笔钱就是为夫人买了一架钢琴。夫人得病后,在家里,买菜做饭洗衣收拾房间……都是他一人承担;外出,或疗养或宴请,他得牵着她的手——这一半是恩爱,更多的是怕她不慎摔倒。后来,文学界的活动越来越多,他总是预先声明:可以两人同去他即参与;若只能一人出席则谢绝。就这样,夫妻相携走了几十年,夫人还是于2008年初夏离他而去了。在八宝山向遗体告别那天,他一见我,我们就双泪长流,互相绞住了彼此的手……他的背有些驼了,体质一下子减了。我担心他的健康,每次见面或通话,他都说:放心,我遭的难多了,能挺得过。他果然挺过来了,他不断见报、出版的作品就是明证。我猜想,他是将对生命的体验、对世态人生的观察拌着绵绵回忆和思念充作了生命的动力。

其实,他不是没有个性。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的火气一旦发起来会烧得人无处躲藏,而且无论对上对下、尤其是对上,否则就不会从审查胡风案起就烧到他这个当时仅仅十几岁的年轻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右派”分子。在我们的交往中,他也曾发过这样一次火儿,那是因为一篇稿子。一天,他在电话中代《北京晚报》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写好后我就寄往报社。可一个月过去了还没见报,此时,《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富强向我约稿,因一时腾不出手,就将《北京晚报》的稿件给了富强。他听后笑说:那就给你们吧。我犹豫,怕犯“一稿两投”的忌。富强说,既然他们一个多月都没发出,责任就不该在你。我想想也是,于是将底稿给了富强。富强麻利,两天后即见诸报端。这下惹了大祸,第三天,柳萌的电话就打上门来:硕儒,你怎么能这么办事?电话那头传来他高声训斥:……人家晚报已排好版,你却先在中青报发出,一个文人总不能一稿两投吧……我让他训得火辣辣的,正要解释,他“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让他弄得又愧又气,愧的是触犯了他重友情、重承诺的操守,气的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如此武断呵斥。我狠狠吸了

两支烟,决定从此不再理他。就这样,我们开始冷战,一年多的时间中断来往。事也凑巧,第二年暑期,分别在三个单位的柳萌、富强和我正好同时去北戴河疗养。先是在海滨遇到富强,没待多说什么,他就笑眯眯地问:“两位老大哥还在冷战?”我一时不知就里,他接着说:“和柳萌啊。他也正在这里,怎么样,见见吧。事情是我惹的,你们总不见面,我也……”我理解他的心情,笑了笑也就没说什么。可还没等我笑完,柳萌已从对面走来。三人见面,谁都无言,可三张笑脸却借着蓝色的大海炎热的阳光化解了一年多的冰冻。

不打不成交或许还真有道理,因为人与人从矛盾的发生到解决更能了解彼此的心性脾气,从而可以少些猜疑多些理解。自这次不快后,我和他都更珍惜我们的情谊、呵护彼此的痛痒。早在这之前,为了能顺利去美国与妻儿团聚,我曾经绕道西非希望顺利获得入美签证,未料到了多哥首都洛美市还是遭到领事馆的拒签。妻的八叔在那里颇有声望和实力,以为在那里获签的机会总比北京多,我于是困在洛美。人届中年,无事可做,尽管生活优渥,那闲在异乡的日子还是逃不脱飘零孤寂的苦涩。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日子里,朋友中柳萌的信最多也最牵动我思乡的情愫。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说:“北京已到冬天,太冷不好出门,坐在屋里伴着暖气的‘咝咝’声读书,忽然想到远在非洲的你……”那时的西非虽到了雨季,仍是酷热难当,听着外面“啪啪啦啦”的疾雨声,想到北京冬天的风声雪飘、灰色胡同里寥落的行人、房间暖气的温馨……我不禁流出了眼泪,恨不能马上飞回北京,与柳萌兄促膝长谈。阔别经年,当我回到北京与他谈起那种感受时,他笑了笑说:“我知道,你舍不得北京,舍不得这些朋友……”

家庭格局已定,不舍也得走。1997年春节前夕,妻替我办好移民美国的手续后,带着已经长大的儿女来京接我了。那时,父亲已离世8年,早已病弱在床的母亲或许是经不起这大喜大忧,竟于正月初五撒手人寰。大悲之中行程在即,为送我远行,朋友们各个都要设宴饯行,我无心情,时间又紧,只好要求大家一起道别。于是作家王朝柱定了太阳宫饭店一座大厅,由他张罗操办这次告别宴会。他还别出心裁,买了一本大型纪念册,要每个人都为我写一段临别赠言,柳萌写的最简单,曰:朋友永远是朋友。

他最重朋友之谊,视友情高于一切。尤其到了古稀之年后,无论文章或闲谈,他总是说,人之为人,情字第一。官职再高,总有下来的时候;财富再多,总有散了的时候。得意忘友情,到老来孤独凄寂没人理,等于慢性自杀。我相信这是他在漫长坎坷的人生路上悟出的道理。正因为这种遵循,他才朋友遍天下,朋友们也为他传统文人身上的君子风所吸引,各个尊他为忠厚兄长。我移民美国后还是他的书信最多、情意最浓。他在1999年深冬的一封信中告诉我:“延龄(李延龄,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走了,没想到我们之中这么好的一位朋友竟走得这么急……临行前他还那么渴望看桃花,可惜时在隆冬,无处可寻……”字是墨写的,我却从中读出了泪水,悲沉的泪水。我抑制不住流出眼泪,即刻落笔写了一篇长长的纪念文字,连载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侨报》上。这是对延龄的纪念,可落笔时,国内众友人的身影无人不在我的眼前,因为柳萌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都一年老似一年,希望大家都健康地多做些事……”

十多年过去了,柳萌兄虽偶有小恙,但仍是精神矍铄、创作丰盈,特别是他三卷本文集的出版,更为他的创作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即:一个真诚的生命,一种率性的为人,一杆朴实的文笔,缕缕深邃的思考。

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不经意地折断了一棵小蒿子。12月的一天中午,我把身体晒得暖暖的,合上阅读了一章的书,起身准备回家。一低头,我看见那棵蒿子躺倒一边,不足两寸高的它在那里面若游丝,奄奄一息,枝叶已经萎焉了。我没有弯下身子做什么,径直步出园子。

傍晚做饭的过程中,想起了那棵小蒿子,我心里不安了。我回忆起在草地上的情形。当时我坐的地方,有许多不知名的小野花在开,紫色的、蓝色的、黄色的、淡红色的、白色的,正因为这些小野花的绚丽,我才选择了那片紫荆树旁的草地,坐下来看书——我喜欢被野草簇拥的感觉,这有点使我恍若置身童年的山上。再仔细一想,我想起了自己脚前还有几棵峰红的小蒿子,米粒大的叶子是深红色的,开出的芝麻

## ■土地与生长

# 对一棵蒿子说道歉

□小山

大小的小花是粉红色的。我简直难以想象它们的模样还能开出花来。太纤小了,虽然也有茎秆和枝叶,却矮小得贴着地皮很难被看到,仅高出地面不足两寸,叫吗能让人操心它们是否开花呢?我们的视线在大树上,也在灌木上,还在摇曳生姿的野花上,怎么能苛求我们像蚂蚁那样仰视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蒿子呢?

但它们确实也在盛开,冬日难得的阳光中,它们匆忙地开了,不知几日花谢,不知结出什么样的籽粒来,

记》里的小人国成员,一边看书,一边手指搓捻之间就让这棵小蒿子所有生命的努力前功尽弃!是啊,想象一下,当蚂蚁再来的時候,发现属于它们的一棵“大树”倾倒了;比蚂蚁还要弱小的昆虫,会惊讶它们的“玫瑰花”夭折了!

晚饭后我有散步的习惯,常常穿行我家附近的夜市。越来越聚集小商贩的夜市,很像我少年去赶集的乡间集市,五花八门的廉价物品紧挨着小马路两旁一字摆开,商贩们面对过客时,眼巴巴盼望我们能驻足看一看。可今天,夜市却空空荡荡,书报亭的姑娘说,商贩们被城管部门驱散了,我的内心顿时黯然……

一棵小小的蒿子,也是大地给人类的礼物。而且我们该记得,生命脆弱的它们,是另外一些生命不可或缺的花儿以及巍峨之树。

7月18日下午,我和我的战友在黄果树风景区谈论黄果树瀑布的雄、奇、险、秀时,我的夫人发来了短信:“生下来啦,是个‘虎妞’,七斤二两。”从这一刻起,我兴奋地宣告:我正八九经地当爷爷啦!小孙女出生后,我去看她几次,许是血缘关系吧,觉得一次比一次可爱,一次比一次亲。我抱着她,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幸福。

在生命状态热烈的夏季,我怀着对玉文化的崇尚与敬仰,以玉意心情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去了一趟魅力无穷的千古玉都和田,参加了第七届和田玉文化旅游节。在那儿,我观赏了那条创造了喧嚣与繁华的玉龙喀什河,祭拜了历经千年仍显葱绿、巍然的两棵树王,瞭望了滋生温润柔美和田玉的昆仑山。回来后,我就一直和我的朋友、同仁为“弘扬玉文化,保护玉资源”工作着,奋斗着、快乐着。

这一年,除南京外,我还在北京、石家庄为战友们和银行系统的从业者讲了几堂课。让我欣慰和高兴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热爱文化,钟情文学。尤其是在衡水看到建行系统的人听讲时津津有味、兴趣盎然,不断报以心领神会的掌声,我更是热血沸腾。真没想到,成天和钱打交道的人还那么喜欢文学!

一年的光景转瞬即逝,日历悄然翻过,许多人许多事出现或消失,尘埃落定,点滴心情凝聚成记忆。梳理2010的心情,复制快乐,粘贴幸福,删除烦恼,存盘高兴。窗外,茂盛着温润的阳光和淡雅的诗句……

## 贺《中华治水史诗》出版

□周克玉

2010年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华治水史诗》首发式,深为振奋。兹赋诗一首,并赠主编何建明、程贤章和总策划杨钦欢诸先生。

百位诗仙著水经,  
程门蜀郡惊梦喜,  
大吕黄钟遗世倾。  
疏凿贯通利万众,  
道遵势循循者荣。  
古来经验堪珍贵,  
要知效功用实践。

## 孤 独(外一首)

□陶雪良

孤独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  
男人像甲壳虫一样生存  
女人目光锐利,捕捉甲壳虫及其世界  
记忆来不及更换碟片  
新的画面和声音在城市街头  
不断地发布现在和未来的魅惑  
酒馆里高谈阔论或悄悄细语  
全都是关于金钱的天文数字  
只剩下孤独还没有被交易  
国富论的哲学将甲壳虫分成类别  
女人目光锐利,孤独远途不在

## 彼 岸

显然已没有时间追寻彼岸  
那一轮圣洁的月光  
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那边苦苦徘徊  
周身都是欲望的枷锁,负重匍匐  
伴着纸币的飞舞  
风都屏住了惯常的呼吸  
城市主义的布景亮出了底色  
写满了关于酒色财气的甲骨文  
遥望那干净而简单的彼岸  
你我只能相互凝望道别。芦苇在眨眼  
月黑风高的夜幕下我要向一叶小舟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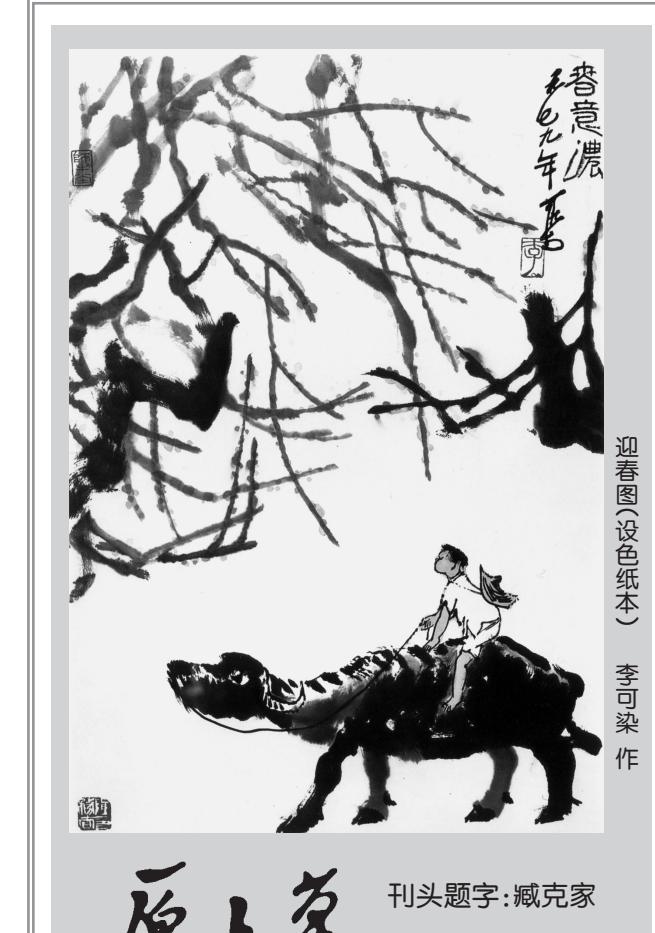
## ■生活质感

# 我这一年

□罗光辉

在隆隆的春雷惊醒大地的季节,我想起了春耕播种的农民,想起了一个作家离开农村后站在城市的发问:谁还会种庄稼?想起了我回故乡在青山村贾村看到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的景象。是夜,我失眠了,要是没入人种庄稼,我们以后吃什么呢?要不要把种庄稼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申报?第二天是二月二,我知道这是龙抬头的日子,也听说了这一天剃头吉祥,于是也去剃了个“龙头”。回到家里,我继续耕耘着我的土地,把心情写在山水间。

我想起了贵阳三都的水族卯节,这是水族人的特别节日,也称歌节,古老的“东方情人节”。在水族卯节,有一水书象形“卯”字碑亭,按水学先生解释,这“卯”字就是一男一女背靠背在谈情交流,揭示了水族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和睦的男女情爱文化。卯日那天,我和叶辛、舒乙、周明等许多作家、艺术家一起在人山人海的卯坡上,在火热的太阳底下,聆听了旋律悠扬的情歌情歌,感受了风情万种的节日气氛,领略了神秘独特的水族文化。



原上草

·第130期·

## ■我之见

如今杭州城已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房价飙升,人心浮躁。好在西湖还是那样美丽安详平静从容。当然,细心的人还是能够发现它悄悄的变化——千年宝刹塔下多了一块招牌:纯真年代。走进去,方知这里已不是过去的普通茶社,而是一家很有文化品位的书吧。经营场所不大,也就两层小楼,上下几间屋,能摆下十来个茶桌,配一些沙发,周边都是书,大都是文学文化社科类的,文人趣味很浓。一楼或二楼都可以看到西湖风景,在这里读点闲书,上网,喝点龙井,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品味西湖春夏秋冬朝朝暮暮的浓妆淡抹,养眼养神养心,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

书吧主人盛子潮、朱锦秀夫妇有心想把“纯真年代”经营成西湖边的一座文化客厅。书吧原来开在城里,淹没在嘈杂的商业街中。文化不占优势,开书吧不是好创意。但为还夫人一个热爱文化的美好心愿,子潮还是下了决心,争取不赔本就是胜利。做卖

买哪能有这种侥幸事。书吧惨淡经营多年,每次年终结账,夫妇俩相对而笑,还好,赔得不多,还能承受。当然,这两人最高兴的还是这一年里,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学者、文化人都来这里,交了好些朋友。过的外地文人墨客,知道这里有个“纯真年代”书吧,慕名而来。本地的更不用说了,这里成了文人朋友的会所,天天一群人在那里喝茶喝酒,高谈阔论。就这样一年过了一年,两人积攒了无数文友,大作家、小文人一律真诚相待。这个赔钱的买卖,倒是让许多青年在这样剧烈的生存竞争环境中,得到一座心灵喘息和精神安宁的小岛。书吧名声越来越大,但终于还是开不下去了。正在生产边缘挣扎的“纯真年代”,得到杭州市政府的救助。得到了西湖边这块风水宝地,才最终摆脱了危局。政府敬畏文化才知道发展文化。

书吧真正操劳管事的,是朱锦秀。她开书吧的想法,最初很“小资”。书吧名字起的很“小资”,书吧情调也很“小资”。她本人并不“小资”。她常常要亲自下厨,给盛子潮的朋友们做一碗当地特产“片儿川”,让大家吃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她自己则在一旁静静看着,脸上带着很中国的那种微笑。而男主人盛子潮生性厚道,为人低调。作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本可以向社会贡献更多的思想,也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文化话语权。不料,他却特别满足地当一个主要是服务于本省文学青年的文学院长,似乎不怕行政杂事缠身。此公好读书好交朋友好喝酒。对于他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喝水,但不可以一日甚至一时无啤酒。他也许不是海量,但特别有耐力。一晚上喝下来,所有的人都晕乎乎的,只有他还在从容不迫一口一口地喝着,好像喝出了某种境界。这些年喝下来,朋友说他每一个毛孔都能挤出啤酒的泡沫。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嗜酒之人,喝再多酒也不会误事。喝一晚上,第二天大事小事全办得好的,一丝不苟。他常常喝到最深度时,打电话给合作者或部下,提醒人家别忘了这事,别忘了那事。子潮喝到高兴时,也把自己的开心事拿来和朋友分享。有一次,他对我说,铁凝答应了,以后每出一本新书,都会把签名本送给“纯真年代”。

书吧开到西湖边后,买卖肯定好多了,也能策划举办一些成规模的文化活动了。朱锦秀忙得不亦乐乎。子潮还是一如既往,不事经营,只管喝酒,最多只当个“托儿”,带个朋友过来。其实,他为了“纯真年代”,是投下了血本的。书吧二楼,有一排很长的书橱,上面放的都是他珍藏几十年的当代作家文人的签名本。王蒙、铁凝、蒋子龙、陈建功、叶文玲、舒婷、王安忆、阿来、莫言、余华、方方、迟子建、范小青、赵本夫……还有不少文化界人士的签名本。有些人虽然不算名人,但也是朋友一番情意,子潮很看重,也摆到一起。不同年代,不同品相,新旧不一,参差不齐,放到一起,成了书吧一道文化风景,每一个来人都会在这里驻足,自然会伸手翻翻。子潮最得意的是向人介绍这些书。如果是文学青年,顺便延伸开来,评介当代中国文学作家作品。他当过评论家,对文学如数家珍。有一次,他向朋友“吹嘘”说有王蒙的签名本,在书架上半天